

汉语国际传播时代对外汉语人才的 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

周 毅 包 镭

摘 要: 中国经济的崛起,国家“汉语桥工程”的实施和美国 AP 中文项目的开考,汉语进入了国际传播时代,对外汉语专业的人才培养亟须进行对应性调整,必须培养外汉专业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以适应海外对汉语教师的需求。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以文化意识的培养为中心,可通过大力开掘隐性课程,选派外汉专业学生赴海外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实习等方式予以实施。

关键词: 汉语国际传播; 对外汉语专业; 跨文化交际能力

作者简介: 周 毅,女,副教授,博士生。(浙江传媒学院 文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包镭,女,副教授。(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旅游系,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 H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552 (2011) 06-0125-04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汉语在全球骤然升温,2000年前汉语在世界多数地区属“非普遍教授语言”(Less Commonly Taught Languages),近年情况大变,前教育部部长周济在2008年孔子学院大会上的报告中说,应世界各地相关机构的请求,我国已建立孔子学院249所,孔子课堂56个。而根据新华网2009年的统计,世界上已有109个国家、3000多所高等学校开设了汉语课程,很多国家学习汉语的人数以50%甚至翻番的速度增长,全世界学习汉语的人数已超过4000万。^[1]对外国人的汉语教育已不再局限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全球的各个角落都有人在教汉语学汉语,汉语进入了国际传播时代。^[2]

汉语国际传播时代的到来为我国提升软实力提供了很大的契机,这方面外汉教师的责任重大。外汉教师不仅教授汉语,传播汉语,更重要的是传播中国文化。他们不仅通过教授语言将汉语中承载的中国文化传播海外,还通过自己的言行,用最自然的方式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和当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一个在海外得到学生爱戴和尊敬的汉语教师,在唤起外国人对中国的友好感情、巩固海外华人与祖国的联系方面功不可没;一支高素质的对外汉语教师队伍,在为国家建设和平宽松的外部环境方面也可发挥很大的作用。英国人曾慨叹自己只剩下两件宝:协和号飞机和英语教学,我们也可以说,汉语教学也是中国一宝。

一、汉语国际传播时代对外汉语 专业人才培养的新要求

面对海外汉语热,政府层面始终积极反应:2001年,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发起海外华文教育志愿者行动,组织国内青年或退休教师以志愿者身份到海外服务;2002年,国家汉办开始尝试用“志愿者”形式,满足海外汉语教师需求;2003年,国家在语言政策层面迈开大步,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提出“汉语桥工程”,“国家汉语教师中国志愿者计划”、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是“汉语桥工程”的核心部分;2004年,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制定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2003年至2007年发展规划——《汉语桥工程》,随着“汉语桥工程”的启动,汉语的国际推广便开始实施,对外汉语教学向国际汉语教学转变;2006年,对外汉语教学向国际汉语教学的转变在理论上也得以充分明确,国家汉办“针对我国多年来对外汉语教学的主战场在国内,以来华留学生为主要教学对象的传统汉语教学模式不适应国外对汉语的需求状况”提出要实施六大转变,第一条转变即为“发展战略从对外汉语教学向全方位的汉语国际推广转变”,^[3]要用“汉语走出去”模式替代“将外国人请进来学”的模式;2007年,美国将汉语列入“关键语言”(Critical Languages),投入巨资开展教学,同年,

国家汉办和美国高等院校董事会合作推出的美国高中 AP (Advance Placement) 汉语与文化课程正式开考, AP 课程和 AP 考试是美国大学选择学生的重要参考, 这一项目的推出, 使得美国的中学也需要大量的汉语教师, 同时也带动了北美地区的汉语热。2011 年 4 月, 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征求对〈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修订一稿〉修改意见的通知》, 提出自 2012 年起将主要培养外汉教学师资的对外汉语专业更名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从国家教育层面确定了对外汉语向国际汉语教学转变。

“汉语走出去”的模式明确显示目前汉语教学的主要实施地在海外, 海外将需要大量的汉语教师, 海外汉语教学反馈的实际信息也是合格的汉语教师奇缺。^[4] 对外汉语专业改名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更明确了汉语已进入到国际传播时代。因此, 如何培养适应汉语国际传播新情势的合格的对外汉语教师, 学界必须在海外持续升温的汉语“热”中保持“冷”思考, 找出应对良策, 尤其是担负培养未来海外汉语师资负责的高校亟须对外汉语专业的人才培养做出有针对性的调整。

我国外汉师资培养开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1961 年, 高教部从大学中文系中挑选优秀应届毕业生至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北京大学进修外国语, 包括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等, 1961—1965 四年间共培养了 118 名出国汉语储备师资。“文革”动乱开始, 这项工作停止了。这段时间的外汉师资培养仅侧重于培养双语能力, 规模也很小。

1978 年, 吕必松提出要把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作为一个专门学科来研究。1984 年 12 月, 时任教育部长的何东昌在外国留学生工作报告会议上明确指出要把“对外汉语”发展成为一门新的学科。^[5]⁽²⁾ 1988 年, 教育部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规定》, 将其归入中国语言文学下设立的“对外汉语”二级学科, 这一专业正式确立。学科的确立使得对外汉语专业人才培养有了规范, 但由于对外汉语起步晚, 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交叉学科, 对其学科归属一直存有分歧, 使得各校该专业的课程设置差异较大。为此, 2003 年召开了“全国对外汉语教学专业建设研讨会”, 会上确定了该专业 12 门主干课程。^[6] 除依旧沿袭 60 年代以来的重视双语教育外, “教学法”、“第二语言习得”等语言教学和学习理论也受到重视, 但文化类课程比较忽略, 仅有“中国文化

概论”一门, 作为一个从事第二语言教学教师的必备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也未在课程设置中体现。当本世纪初起我们较多地向海外输出汉语教师时, 外汉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欠缺的问题就引起了注意, 认为必须培养派到国外任教的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并认为这是出国汉语师资培训工作的“当务之急”。^[7]

近年有些院校增设了跨文化交际概论的课程, 但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样的现状和汉语国际传播的情势是不匹配的, 海外之所以合格的汉语教师奇缺,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直以来我们忽略了外汉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派往海外的教师很多缺乏对异文化的宽容度, 导致跨文化交际冲突。因此有研究者提出, 目前应将“对外汉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培养跨文化人才”。^[8] 这个说法虽然有些矫枉过正, 但跨文化交际能力无疑是外汉专业学生的核心能力之一, 必须大力培养。

二、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是外汉教学的发展使然

培养外汉专业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不仅是汉语国际推广的情势使然, 也是第二语言教学的教学目标所要求的。

在第二语言教学领域, 对教学目标的认识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从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到海姆斯的“交际能力”,^[9] 后又一致认同教学目标为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al competence)。人们普遍意识到, 目的语使用的“适宜性”是在跨文化交际的框架中定义的。^[10] 1970 年,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科学委员会就提出了建立跨文化的对外德语教学和研究的主张, 核心概念是“了解对外德语在国外的特性”, 并且认为不应把大学的对外德语专业看成是纯粹的外语教学法专业, 而应当理解成是一个面向学习实践、面向外国语言文化和人类文化学的专业。^[11] 从对外汉语学科理论发展看, 第二语言学习者须习得的是跨文化的交际能力。

受国外第二语言教学的影响, 我国外汉教学界在对留学生的汉语教学实践中对跨文化交际的认识也逐步深入。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张占一借鉴奥斯华尔特的大小 C 文化划分提出的要进行“交际文化”教学的主张。张占一认为: “所谓交际文化, 指的是在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熏陶下的人, 在交际时, 由于缺乏有关某词、某句的文化背景知识而发生误解。这种直接影响交际

的文化知识，我们就称之为‘交际文化’”。^[12]张占一提出“交际文化”，强调要在外汉教学中呈现隐藏在言语交际中的文化因素，指导学习者有效地避免“跨文化冲突”（culture shock），实现成功交际。张占一的看法引起吕必松等人的共鸣，海外从事汉语教学的学者也对此展开了讨论，黎天睦等探讨了美国学生汉语学习时的跨文化因素，认为必须进行“交际文化”的教学。^[13]80年代末国家汉办拟定的《汉语水平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明确提出了“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教学原则，一些权威教材也指出了“对外汉语教学的跨文化教学性质”。^[5]^[108]美国外语教学学会制定的《美国21世纪外语学习标准》是目前得到普遍认可的外语教学标准。它规定的五大外语教学目标是“沟通（Communication）、文化（Cultures）、贯连（Connections）、比较（Comparisons）、社区（Communities）”，简称“5C”标准。AP中文项目的教学目标、要求均严格按照“5C”标准执行。“5C”的核心是重视具体语境中的沟通交流能力，即交际能力。这就要求从事汉语教学的教师首先具备这一能力。

2007年国家推出《国际汉语教师标准》，对从事外汉教学工作的教师所应具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做出了一个全面而基本的描述。《国际汉语教师标准》分为五个模块十项标准：模块一：语言基本知识与技能（标准一：汉语知识与技能；标准二：外语知识与技能）；模块二：文化与交际（标准三：中国文化；标准四：中外文化比较与跨文化交际）；模块三：第二语言习得与学习策略（标准五：第二语言习得与学习策略）；模块四：教学方法（标准六：汉语教学法；标准七：测试与评估；标准八：汉语教学课程、大纲、教材与辅助材料；标准九：现代教育技术及运用）。模块五：教师综合素质（标准十：教师综合素质）。^[14]从国家标准看，跨文化交际能力是海外汉语教师必须具备的能力之一。但从目前看，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并没有真正落实到对外汉语专业的人才培养上，各校至多只是设置一门跨文化交际概论的课程，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有效措施。

三、对外汉语专业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途径

高一虹在分析比较了多个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模式的局限后提出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应以文化意识（cultural awareness）的培养为中心，并指出文化意识

“是对文化多元性的意识和对差异的宽容态度、对异文化成员的共情能力，以及对自身文化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的觉察和反省。这种文化意识应能帮助学习者主动地获取、深层次地处理文化知识，并在跨文化交际行为方面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和创造性”。^[15]文化意识的培养，通过跨文化交际方面的课程进行实施是一个途径，但仅仅依靠一两门课程的理论学习是不够的，必须整合各类课程的中外文化要素，特别是要在跨文化环境中进行体验，在具体的跨文化交际的情境中培养外汉专业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这种培养，下面的方法较具可操作性。

（一）大力开掘隐性课程

学校教育中的隐性课程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教科书中的隐性课程，第二层面是教学活动中的隐性课程，第三层面是教学活动之外的隐性课程。这三层构成了一个动态的隐性课程的三维结构。^[16]这三类隐性课程在外汉专业学生的培养中都需大力开发。就前两个层面看，由于语言的学习同时也是文化学习和思维方式学习，外汉教师只有自己充分明了汉语中所蕴含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习俗，了解学生的母语文化，才能避免跨文化冲突，才可能帮助学生正确地理解汉族人的交流态度和方式。因此，大力挖掘语言类课程的隐性部分，特别是挖掘语言中所蕴含的文化要素，即前所述的“交际文化”，在外汉专业学生的培养上显得尤为重要。必须借助教科书和教学活动层面的隐性课程，使外汉专业学生在课堂上尽一切可能对中外文化有所领会掌握。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核心部分——文化意识培养的关键是提高文化差异的敏感性。此类敏感性除了熟知跨文化交际理论之外，更来自跨文化交际活动中的体验和感悟。使学生在就读期间就可以参与跨文化交际活动，获得对非本土文化的具体体验，大多有赖于教学活动之外的隐性课程。这一层面的隐性课程由于完全是在课外，可实施的活动范围广、学生参与性强，是提高文化差异敏感性的佳径，也是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就目前各高校的办学条件看，可多方拓展与海外院校学生团体的寒暑假互访活动，或与国内各留学生教学点的日常联谊活动，以及与当地外资企业、海外民间机构团体等的各项合作活动，多渠道、多层次地为外汉专业学生创造各类跨文化交际实践机会，提供跨文化交际的真实情境，使学生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习得对文化差异的宽容和对异文化成员

的共情能力,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行为方面的灵活性和创造性,从而具备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二) 选派外汉专业学生赴海外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实习

越来越多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在海外的大中小学落地生根,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高校承担海外孔子学院、孔子课堂的汉语教学和汉文化推广任务,不少高校甚至建有多个孔子学院或孔子课堂,高校外派教师普遍人手不足。建议选派外汉专业高年级优秀生作为外派教师助手赴海外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实习,负责完成部分教辅工作甚或汉文化推广任务。这样做,一方面实习学生可以缓解各校外派人手不足问题,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可使实习学生直接进入异文化情境,强制性地将所学理论快速施之实践,切身领悟多元文化的不同,提升其与异文化成员的共情能力,从而具有较好的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同时,经由外派实习学生和国内同学间的交流,国内同学也可间接获知跨文化交际的经验,同样有助于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此外,有条件的高校可适当政策倾斜,在与结对的海外学校互派学生时给予外汉专业学生更多机会;还可安排留学生入住外汉专业学生的宿舍,既可帮助留学生尽快习得汉语,也增加外汉专业学生跨文化交际的机会,提升其跨文化交际能力;也可组织外汉专业学生短期游学或海外旅行等等。

参考文献:

[1] 成舸. 世界“汉语热”远超预期学习人数已超4000万[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9-03/13/content_11002421.htm

- [2] 吴应辉. 国际汉语教学学科建设及汉语国际传播研究探讨[J]. 语言文字应用, 2010(3): 37-44.
- [3] 许琳. 汉语国际推广的形势和任务[J]. 世界汉语教学, 2007(2): 106-110.
- [4] 虞莉. 美国大学中文教师师资培养模式分析[J]. 世界汉语教学, 2007(1): 116-119.
- [5] 赵金铭. 对外汉语教学概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6] 周毅. 简论对外汉语专业学生的中国文化素养培育[J].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 2007(5): 27-29.
- [7] 黄宏. 浅议对外汉语公派出国教师的跨文化交际问题及其对策[J]. 海外华文教育, 2002(1): 37-42.
- [8] 詹向红. 对外汉语专业跨文化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思考[J]. 中国大学教学, 2009(6): 47.
- [9] Hymes D. 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n Pride, J. B. & Holmes, J. eds. Sociolinguis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 9.
- [10] Byram, M, Morgan, C. Teaching - and - Learn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1994: 62
- [11] 陈岩. 文化理解能力——21世纪外语教育的重要目标[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0(4): 102-110.
- [12] 张占一. 汉语个别教学及教材[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4(3): 57-67.
- [13] 元华. 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界文化研究20年述评[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3(6): 104-109.
- [14] 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 国际汉语教师标准[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 2-47.
- [15] 高一红.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跨越”与“超越”[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2(10): 27-31.
- [16] 傅建明. “隐性课程”辨析[J]. 课程. 教材. 教法, 2000(8): 55-59.